

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丛书

三 国 演 义

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

罗贯中 著
吴如嵩 评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三国演义 上

吴如嵩评点

罗贯中 著
毛宗岗 修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吴如嵩评.-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1

(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033-1104-5

I. 三… II. ①罗… ②吴… III.《三国演义》评论-中国
IV. I207.41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3.625

字数:806千字 定价:53.00元(膜)

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丛书

编委会名单

总策划

范传新

刘增新(执行)

总主编

李际均

姚有志(执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泽民 王显臣 刘增新

刘先廷 乔松楼 李际均

吴如嵩 范传新 周献明

姚有志

总 序

情系天下兴亡，锻铸民族之魂 ——简论中国传统军事文学

李际均

在中国 5000 年的历史中，曾发生过 6000 余次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可否认，其中有许多互相征伐侵夺的不义战争，但从整体来说，谋求国家统一、抵御外侮、反抗封建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代表着中国战争史的主流。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为军事思想和军事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是最早出现兵书、形成兵家学派的国家，又是最早确立和平理念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天才的文学家，其中有许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故而言兵者不止兵家，论兵者不止兵书，这正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军事思想遗产的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军事典籍和军事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情系天下兴亡、锻铸中华民族之魂的巨制华章。

战争和战略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胜负的结局，而且在于思想文化的展开。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都做出过贡献，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也存在于各个民族。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中



国,是民族英雄;荆轲为了燕国生存,悲歌辞易水,拔剑刺秦王,也是民族英雄。清圣祖玄烨平定新疆和三藩之乱,是民族英雄;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施琅剿灭台湾地方割据势力,也是民族英雄。如此等等,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以正统论英雄,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有时他们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他们又都是站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巅峰,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中国历代军事文学著述,展现了军事历史的生动画卷,探索战争哲理和将帅修养,表现对和平的追求和对社会安定的向往,赞颂爱国牺牲精神,讴歌正义之师和热血男儿,也反映征夫怨妇之苦和对战乱与灾难的控诉与质问。军事文学参与了民族智慧的培育,民族精神的锤炼和塑造,蕴含着民族的情怀与期望,而且往往超越军事本身,体现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寄托。总之,军事文学表现出历史上非常时期的民族精神的底力。

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与此相应的军事文学也比其他文学成熟得早。中国军事文学源远流长,是和战争的起源、发展相伴而生的,其载体主要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根据前者改编的戏剧,它们各有其发展的脉络,并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军事文化的大厦。就其大致而言,《诗经》是中国军事文学之滥觞。三代以前的书史典籍大量毁于秦火。孔子删诗,从3000篇中选存300余篇,大都是自谦“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大圣人以酷爱和平之心选留之作,然而保留下来的《诗经》中,仍有相当的有关战争的内容,这是中华民族记叙战争和军旅生活的最早吟唱。其中有表彰武功的,记述征战涉险的,感伤戎役和别离之苦的,赞美将士和军容之盛的,诉说袍泽情谊的,描述凯旋还师的。从诗经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时期的诗文,都有大量涉及军事的内容,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其中的文化色彩与美学意蕴,而且也能领略其中关于战



争与和平的理念。这些军事诗歌的作者有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也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诗言志”，“风格即其人”。他们倚马行文，横槊赋诗，或表达“封疆之守，应死封疆”的壮志，或抒发以身许国的豪情，或记叙惊心动魄的鏖战，或吟咏大漠边关的风光，或表露感世伤时壮志难酬的内心痛苦，具有一种意境苍茫悲壮、气势磅礴雄浑的风格和昂扬激越的爱国情愫。

汉魏六朝从《垓下歌》到《木兰诗》，语言古朴苍劲，气势雄浑，如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表现驰骋疆场的豪迈气概和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反映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人间惨象。唐代的边塞诗，如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戴叔伦“愿得此身長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表现以身许国，慷慨悲歌之志。许多边塞诗，在表述爱国豪情的同时，又流露久戍思乡的愁苦。杜甫“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更是一种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宋代衰世，诗人既有效命沙场的壮志，又有“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赤诚与无奈。明代陆防边患未了，海防外寇入侵，在边塞诗的基础上增加了抗击外敌、誓平边患的内容，具有为民族自卫而战的思想情操。戚继光“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郑成功“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都是这种豪情的表露。清初康熙皇帝玄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的诗作“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表现强边固防，励精图治，风格雄浑而清新。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衰，这个时期的诗作充满反思、悲愤，哀叹王朝没落，痛斥清廷丧权辱国的心情。如曹润堂“不信中原力已疲，忍将和局误师期，谁知辽海消兵日，正是军民痛哭时”，显示有血性的中国人坚决要求抵御外侮的爱国立场。到了清末，救亡图存的壮歌反映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如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壮烈诗篇所表现



的情操,正是中华民族精神永不泯灭的根基所在。

中国古代散文,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长期形成的巨大而丰富的文献积累,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和疏谏之祸的艰难时世中产生的,因而这些著文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军事散文也许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学中,在史实记载、哲学观念、军事思想和经世致用方面,含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种。由于军事散文涵盖甚广,包括有关军事的史叙、传记、政论、奏稿、文告、谏议、书札、诏书、誓词、檄文、说帖、书信、随笔、杂记等等。其作者层次和素质较高,包括历代贤相良将,幕僚吏佐,文史巨匠,以及开明君主。有不少是当时当事的军事统帅,爱国志士,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他们对现实大都抱积极态度,他们的散文著作在反映现实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历史的褒贬,对现实的批判,对战争的思考,对政治理念的诉求,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史实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价值。中国古典军事名言、成语、典故多出于此。军事散文中的有些内容还被直接引用到军事史著和历史小说中去。

中国军事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如《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310》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令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埋伏之地加以歼灭。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纪实文学。先秦的经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如《尚书》、《易经》、《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墨子》、《管子》等,都有极为丰富的军事内容,反映当时频繁的战争和尖锐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开中国古典军事散文之先河。例如《左传》就有关于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的描述,具有军事文学与军事史学的双重价值。《管子·参患》中说“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用现代语言说,就是:



兵器破旧而不精良，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士兵不能打仗，等于把将帅奉送给敌人；将帅不善用兵，等于把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持之以恒地增强军事实力，等于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段话充满深刻的逻辑性、警示性与语言美感。商鞅的《战法》、《兵守》都是优秀的军事散文。至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论著，更具有军事理论、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学的多重成就。西汉军事政治散文的代表作，如贾谊的《过秦论》从政治军事战略的高度探讨秦王朝覆亡的原因。晁错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基于对当时边防的空虚，政治的腐败，以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提出缓和阶级矛盾，加强国防的切实措施。司马迁的《史记》中，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堪称最优秀的军事纪实文学，对军事形势、统帅性格、战略战术和作者倾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雄深雅健，逸气纵横。魏武曹操，戎马一生，战阵中挥毫，多寓悲凉慷慨之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情辞恳切，要言不烦，堪称“章表之英”。后人所云：“读诸葛亮《出师表》不落泪者非忠臣；读李密《陈情表》不落泪者非孝子。”足见军事散文影响之深。汉赋虽然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但其中的《武备赋》表达对文治武功、一统天下的赞颂，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文学价值。唐代李华《吊古战场文》批判天宝时期穷兵黩武，感慨悲凉，凄恻动人。宋代军事散文中，有检讨前代战略得失者，如《六国论》、《何博士备论》；有论及将帅修养操守者，如《心术》、《留侯论》。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和散文家，他的散文中有不少关于军队建设的精辟见解，例如《与王子醇书》指出要加强收复地区的守备，安抚少数民族，争取其共同抵御西夏统治者，极具战略远见。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战乱频仍，国家危难，军事散文具有抒发内心的积愤，关切国家安危的鲜明特点。李纲《议国是》、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岳飞《五岳祠盟记》、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十分尖



锐,出现一些讴歌民族英雄的散文著作,如姜振英《奇零草序》、邵长蘅《阎典史传》、全祖望《梅花岭记》等,充满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与悼念之情。洪秀全《誓师檄文》、杨秀清《奉天讨胡檄》堪称农民起义军事散文的代表作。清代后期名将左宗棠是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历史功臣,对于加强海防和兴办近代工业亦有贡献。他身后留下一百余卷文著,既有运筹帷幄的奏稿,也有言切情深的家书,其中有许多堪称优秀的军事散文。清末以邹容《革命家》、林觉民《与妻书》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著作,更是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甘洒一腔热血的千古绝笔。

比起中国古典军事诗歌和军事散文来说,军事小说是晚熟的。它在哲理思辨、军事思想与军事事实含量方面,也许不如军事散文,但它的读者群和社会影响却大于军事诗歌和散文。它是形象化的兵书、戏剧化的战争史,特别是作为中国农民战争的教科书,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军事历史小说中,依据基本史实,融汇兵法思想,渗入作者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战争的理解,把社会生活、人物命运和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融为一炉,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开复杂而尖锐的谋略较量。作者托古喻今,表达自己对当世政治的态度,寄托人民群众渴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天下一统的愿望。歌颂智勇仁义,揭露和鞭挞昏聩、荒淫、残暴的帝王和诸侯,以及奸诈、阴险、贪婪的佞臣;赞颂胸怀大度、仁政爱民、用贤纳谏的开明君主,特别是能够经国治军、谋事运筹、统兵决胜的忠臣良将。概括起来,就是对于“忠孝仁义”这一道德品质的歌颂,对“明君贤相”的理想寄托。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也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评介和欣赏。中国军事历史小说中对智慧与谋略的尊崇,具有永恒的意义。根据军事诗歌、散文特别是小说改编的戏曲,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



中国的小说文学经过 1000 多年的发展与变迁，到明代中叶达到成熟阶段，并出现以《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长篇军事历史小说。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是战争最频繁、军事政治斗争最复杂尖锐的两个时期，而反映这两个时期的两部演义作品——《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都十分生动地描述了那个时期军事政治斗争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关于谋略的运用，构成这两部名著的独特风格与文学中的高品位。同时，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在主要史实上基本符合历史典籍的记载。例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隆中对”，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只有几十个字，便把战略方针包括战略基地、战略方向、战略重点、战略联盟和战略时机说得明明白白。《三国演义》就是按这个战略历史的脉络写就的。大文豪对军事的领悟，常使我们感到惊叹。当然他们毕竟不是军事战略家，没有认识“隆中对”在历史上是成于斯、败于斯的。“隆中对”战略计划，自公元 207 年提出，到 257 年姜维最后伐魏止，50 年没有进行战略转变。毛泽东指出蜀汉的教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由此也可以看到军事文学与军事科学的区别。

中国古代典籍往往具有多重性质。例如《老子》，既是哲学，又是兵书，还是散文。《周易》去掉历史涂抹的浓重的神秘色彩，其本质是一部充满哲学思维，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的统帅纲要与资政参考。它们的价值不完全在于真实历史的含量而在于概括的社会和军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军事文学与兵书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兵书战策是战争经验的理性总结与升华，从而形成军事指导思想与原则。军事文学不仅从兵书战策中获得智慧，更从生活中汲



取灵感和素材,融入情节的历史,形象化、性格化、感情化了。它不仅直接记录了战争的过程和史实,而且还表达对战争的认识和感受,领悟战争的真谛,倾诉战争带来的苦难,反思战争的意义。军事文学中,不仅包含着大量的爱国情操、英雄气概与献身精神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史实,而且军事文学本身携带对政治理念、军事运作、社会风情、伦理道德的评介,为研究社会史、军事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军事文学是充满哲理的文学,也是饱蕴情感的文学,是剑与火、心灵与智慧的记录。它以雅俗共赏的形式组成一个时代的背景,勾勒一个个生动的画面,记载当世的理性与情感,印记中华民族前进的步履。它比纯军事理论更能吸引人,为众人所接受,使人们了解到隐藏在政治、军事的背后更为深刻的东西。因此军事文学名著也是发掘军事遗产、发扬民族文化的主题之一。

中国传统军事文学中,还有占相当比重抨击统治者穷兵黩武行为的内容,这在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如“不知何处吹羌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都代表一种厌战、反战、非战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应当说,上述内容带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也不可否认古代诗歌、散文的作者多为士大夫,受儒学熏陶深,“迂阔不周世用”,在其作品中不免有不问战争性质,一概以低沉、消极的态度对待的倾向。至于历史小说存在的问题,虽然不能像清人章学诚的《丙辰杂记》中所评说的:“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但自西汉后期起,“谶纬之学”兴起,影响到兵书中也渗入了一些“风角杂占”、“奇门遁甲”之类的迷信内容,军事历史小说也受其影响并进行了艺术夸张。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然而军事小说毕竟不是史书也不是兵书,我们指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军事历史小说同历史真实和兵法



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局限性，而不是用今天的军事科学去要求和规范它。

本书所选评的，是从先秦到辛亥革命这个大跨度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中国军事文学名著，分编为诗歌卷、散文卷、长篇小说卷，每卷又分若干部。这套书所收进的，虽然不敢说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学的全部精彩部分，但它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算是最完整的，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加以评点和赏析，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现在之所以投入如此大的精力编撰这本书，其目的在于从军事的角度，凸现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军事思想、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并反映军事文学的本质与军事学者的眼光和认知度。它不仅是军事学者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遗产的选评，也是对历史文化的整理，是把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传统文明呈现给21世纪的读者。相信本书会受到文学、史学、军事学研究和爱好者的欢迎，对读者增长文史知识，加强文学素养，借鉴历史经验，领悟军事智慧的启迪，特别是接受中华民族正气的熏陶，都有极大的益处。当然，这个工作仅仅是开始，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光大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出贡献。

前言

吴如嵩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一套《军事学者评点古典军事文学名著丛书》，我因喜其创意新巧而承担了对《三国演义》评点的撰写。

从军事学术角度评点《三国演义》，不失为一种阅读与欣赏的新途径。历史上，虽然有余象斗、叶昼、钟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李渔等五家的评点本，但那是文学评论。文学同军事学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是形象思维，研究的是主题思想、人物刻画、布局结构、语言特色等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逻辑思维，探讨的是战争观念、治军思想、战略战术等军事规律方面的问题。

那么，如何从军事学角度去评点这部历史小说呢？我觉得主要地要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史实与虚构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不能不首先谈到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丙辰杂记》。



《丙辰杂记》把演义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实则概从其实”，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二类是“虚者明著寓言”，如“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三类是“虚实错杂”，“惟三国演义”。

对于前两类，章学诚持肯定态度，认为“皆无伤也”；对于第三类的《三国演义》则大张挞伐。他说：“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写历史小说，若全凭实事，不允许虚构，那就成了史话，不成其为小说了。显然，章学诚对《三国演义》的非难是欠公允的，他的文艺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由于《三国演义》在内容和题材上的特殊性，章学诚所担心的读者“为所惑乱”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高儒《百川书志》）进行创作的。“正史”依据的是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刘宋人裴松之为之作的“注”；“小说”就是吸收元朝《全相三国志平话》之类民间文学和稗官野史方面的材料。

不难发现，《三国演义》关于东汉末年的纷争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叙述，关于重要人物的言论活动的记述，关于影响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六场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南征北伐、魏灭蜀、晋灭吴）的描写等等，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金圣叹说得好：其书“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毛本序》）。

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为了使故事更加曲折、人物更加生动、内容更加丰富，罗贯中虚构一些情节、改窜一些事实，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问题是，罗贯中的虚构不是细枝末节的虚构，而是对个别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作了较大的改动。



比如“六出祁山”或“五出祁山”一语，在一些军事学术著作中常可看到。其实，诸葛亮只出过两次祁山，“六出祁山”是罗贯中的虚构。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出一点“六出祁山”之类的错误，还只是常识问题，但如果有一些重要观念（如正统观念）、重要人物（如曹操、刘备、周瑜）、重要战争（如黄巾起义、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的认识上也分不清“实”与“虚”，“为所惑乱”，那就影响我们对《三国演义》的正确评价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1959年初，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发表后，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牵涉的问题很多，而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实”与“虚”的问题。作为历史人物，曹操是个英雄；作为小说人物，曹操是个奸雄。一些同志却把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等同起来了，正所谓“为所惑乱”了。这场争论告诉我们，分清《三国演义》中的史实与虚构，对于正确评价它的价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第二是科学与美学问题。

为了有益于读者，防止“为所惑乱”，区分史实与虚构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虽然增加评介者许多工作量，但是倒也并不十分困难，只要对照一下史书就可以了。实者实之，虚则虚之，较为容易。真正的困难之处，却在于如何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分析和评价这部“虚实错杂”的《三国演义》在军事上的价值。

觚庵在《觚庵漫笔》中曾这样评价过毛宗岗的评点本：“《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圇吞下。”这个评价是很恰切的。如果说，毛宗岗从文学艺术上引导读者如何欣赏与研究《三国演义》，不使囫圇吞枣，达到了评点的目的；那么，如何从军事学术上引导读者去欣赏与研究《三国演义》，不使囫圇吞枣，这



就应当是本书的目的了。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因为,从本质属性上看,《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罗贯中之所以要创作《三国演义》,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一部引人入胜的三国史话,而是通过对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表达他的正统观念、忠义思想以及对仁君贤相的理想追求。

这样一来,当我们用军事尺度去考察这段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罗贯中的许多创作思想发生碰撞。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再三表示“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一意孤行,大举伐吴,结果遭到惨败。

对于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轻率言行,罗贯中不是批判而是欣赏,不是贬斥而是宣扬,把刘关张个人之间的信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用科学的、理性的标准来评价刘备,我们就必须批判刘备错误的战略指导和笨拙的作战指挥。罗贯中考虑的则不同,为了塑造刘备与关羽的金兰之谊,前有关羽秉烛达旦、封金挂印、千里单骑、古城相会等一系列不忘旧主的描写作铺垫,后有刘备不重江山重义气的伐吴战争相辉映,于是刘备与关羽作为美学的人物形象便树立起来了。

作为文学家的罗贯中,他的气质偏重于情感,追求的是美学而不是科学。因此,他在“因史以演义”的创作过程中,虚构也好,改窜也好,他自有他所遵循的文学规律。比如我们在评介时,可以指出历史记载:铜雀台建于赤壁之战之后,空城计乃是虚构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它,只能承认它。换言之,我们只能就《三国演义》来评介《三国演义》,在此基点上再适当指出在那“君不仁、臣不忠”的三国时代,刘备、曹操、孙权之间既无所谓正统与旁统,也无所谓仁君与奸雄,他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割据势力,谁都可以夺